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本刊8月號的「二十一世紀評論」登出崔之元與昂格的兩文後，不出所料，立即引起各方面的興趣。除本期首欄一組四篇文章繼續討論外，旨在及時溝通讀者、作者、編者的本欄，也有所反應。

——編者

「制度創新」的討論 很有意思

24期的「制度創新」這個題目頗有意思，但我不太同意他們把問題歸結為「制度拜物教」，也看不出「後福特主義」和論證中國的鄉鎮「經濟民主」有何相關。所謂「傳統的統一的財產權」只是Legal fiction：財產「權力束」的分離與重組，只有經過批判法學家的討論才成了新聞。「雞」長牙齒一節敗筆，不能自圓其說。不過提醒了讀者，世界上還有跟「第二次思想解放」不搭界的事情。

馮象 香港

94.9.5

還應注意「婦女解放」 的意義

崔之元的文章挑選了西方學術界最近二十年發展起來的

幾個新學派，用之於分析中國現狀，強調思想解放與制度創新，尋求在中國實現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的道路。我對他這些基本觀點，深有同感。

但崔文未涉及的「女權主義」，也是60年代後期發展起來的重要思潮。女權主義相信男性與女性主體以及兩者間的差別，主要不是生理決定而是因社會形成的。西方女權主義的另一個基本概念是「家長制」，有些女權主義者把家長制與資本主義制度、國家權力聯繫起來，有些只把它局限在家庭關係中，有些則把它作為迄今為止文明的基本特徵孤立於不同的社會形態及政權形式之外。無論哪一派，在邏輯上都把男性統治看作婦女解放的最終障礙。

女權主義的目標並不是以女權取代男權。而是在追求女性解放的同時，重新審查、批判、解釋「解放」的概念，從而把人類解放的口號和目標進一步具體化、世俗化了。

中國當前尚處於轉變過程中，而其所帶來的社會後果，暗含着雙重性質。舉例來說，聯產承包曾被農民稱為土改後的「第二次解放」，但近年來，許多地方革捐雜稅加上剪刀差回升，是不是在葬送解放的成

果？又如民工潮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包括勞動條件、安全作業、工資報酬等等，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便與「解放」的目標相左。再如大鍋飯打破後，國家似乎未能運用法律等手段保護工人的合法權益，得看工人能不能在工會中組織起來幫助自己。總而言之，從「解放」的眼光看到這種兩重性，從而不斷調整改革的方向，使之大步地向人的解放邁進，這正是女權主義的任務。

林春 美國

94.8

上海—廣州 「中國雙城記」

拜讀24期樂正論上海與廣州的大文，獲益良多，但似乎亦尚有未盡之處。首先，論廣州而不順勢兼及其革命傳統，特別是20年代的緊張局面（例如省港大罷工）未免美中不足。其次，英人屬意上海似乎是從鴉片戰爭時就已經有的戰略考慮。這一點，文中只是蜻蜓點水。第三，上海的自然優勢似乎也值得作更充分的論述，蘇杭在當時是全國經濟和文化中心，而且已經有幾個世紀歷史。第四，上海腹地比廣州大了恐怕有十倍以上，這是個潛能優勢，即在今日其實亦仍然存在。

當然，從中國整體發展來衡量，則又可以籠統的說上海成為現代化的中心，廣州成為民族主義的大本營。它們對中國的作用表面相反而實際上是互補的，這頗與伊斯坦堡一

安卡拉之於土耳其，和彼得堡—莫斯科之於俄國有相似之處。也許中國亦正需要這樣的一洋一土，一柔一剛，一巧一拙的配合以求其現代化。這個觀點可以用「中國雙城記」這有趣的題目來概括。

鄭芳 香港

94.8.20

讀者對當代藝術討論和現代性問題，依然有很大的興趣並提出種種看法。

——編者

在文藝美術界的轟動

自從貴刊今年四月號刊登「當代藝術的危機」三篇文章以來，在大陸文藝美術界已引起「轟動效應」，似乎比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還要引人興發。這個「信息」你們一定感到有趣吧！

吳甲豐 北京

94.9.4

文化傳統與後現代言說

我認為，時下中國式的後現代言說中關於價值中立、「平面產生深度」：關於惡夢醒來是早晨之後「怎樣都行」：關於精神寂滅便放縱物慾：關於在相對主義、虛無主義之間狼奔豕突等等，並不是某天早上突然從天而降的怪物，它們是中國傳統文化自身結構性缺陷在當代歷史條件下全面而低級的演出。最便於理解和接受的

東西偏偏是深度模式與中心話語的拆解，進而成為對理想、信仰、真理、責任的最激進的譏諷，這是徹頭徹尾的中國式的哲學闡釋與實用。同理，中國當代文學理解和接受西方現代主義，大多學習其技法皮毛，而在精神痛苦與追尋、靈魂放逐與拯救等實質層面的體驗與溝通上，卻勢比蜀道青天。相反，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走向和同是舶來品的後現代主義能一拍即合，心心相印，甚至還有更為精緻的、有特色的發明創造，這也就無足奇怪了。我們的文化傳統自身就提供了使後現代主義生根發芽的天然土壤。

沒有耐心對文化傳統差異及其內在性格進行深入認真的研究，而僅僅滿足於拆解與命名的愉悅，所有關於後現代主義的言說都是沒有根基的：既不能真正知道自己在講甚麼，也無法給出言說在文化傳統與現實境遇的關係中的意義。值得注意和令人擔憂的是，在眾多後現代言說者那裏，這種言說正以多元話語的方式日益成為這個時代的霸權話語。而在他們的文本操作中所致力消解的，恰恰可能是中國文化傳統中軟弱、稀薄又至關重要的東西。這樣的言說與消解激情，如果不是為文化結構缺陷及本源素質匱乏尋找託辭和藉口，如果不是為劣質生存提供理論解釋的「合法性」，至少也是對歷史與文化傳統的無知，是對現實境遇真實問題的漠視，更有可能是被製造話語、爭奪話語命名權的衝動蒙蔽了可貴而樸素的良知。

陳福民 上海

94.6

開展「現代」與「後現代」的學術對話

忙裏偷閒讀完了24期《二十一世紀》。這一期似乎仍有一個主題，即所謂後現代文化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僅是國際學術界的熱點，也成為今年以來大陸文化界的熱門話題。這說明中國學術不再與世界隔絕。

後現代文化批評的出現與海外的一批年輕留學生張寬、劉禾、劉康、唐小兵、孟悅在中文刊物的引介有關，更重要的是北京一批青年學者張頤武、陳曉明、王岳川、戴錦華等人的熱烈鼓盪。最近幾乎翻開大陸每一本稍有影響的文化類雜誌，都有他們的文章。他們不止於一般的介紹西方的後現代和後殖民文化話語，而且還根據這一話語對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化歷史和現實有了一個初具框架性的闡釋。

不管我們是否同意這一思潮（這並不重要），我以為以此作為契機，開展一場現代與後現代的學術對話是很有必要的。儘管中國目前各種話語的理論分歧遠遠沒有西方的大，但人家能對話、溝通、討論，我們這裏卻只有獨白。後現代文化的多元不應該是獨白式的眾聲喧嘩，而應該是在遵守形式化的對話規則基礎上的對話。沒有對話就不是真正的多元。我希望《二十一世紀》可以在提供對話方面發揮進一步的作用。因為《二十一世紀》所據的地理優勢，及其在溝通海內外的功能上，是別的雜誌所不能替代的。

許紀霖 上海

94.9.2